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对于抗日战争，沈从文还有一个隐秘的期待：他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净化民族的灵魂，使民族和国家获得新生。就像“有些鱼也是在逆水里浑水里才能长大”一样，“战争使人类灵魂变得粗糙”，这可能是一个民族获得新生的开始。沈从文一直将“生命重造”、“民族重造”、“国家重造”作为自己的创作使命，一个既高远又切实，既具体又抽象的使命。战争爆发后，沈从文从这个民族在战争中的表现，看到了“重造”的希望，他似乎感觉到，战争在毁灭这个民族的同时，也正在使它获得新生。

战争中的文人与文学

文学中的军人与战争

火与歌

中国

现代文学、文人与战争

张全之/著



战争中的文人与文学

文学中的军人与战争

火与歌

中国现代文学、文人与战争

张全之/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火与歌：中国现代文学、文人与战争 / 张全之
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11

ISBN 7 - 80148 - 975 - 6

I. 火… II. 张… III. 现代文学 - 关系 - 战争 -
中国 IV. I209.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6348 号

火与歌——中国现代文学、文人与战争
张全之 / 著

责任编辑：于九涛

责任印制：韦 舰

装帧设计：SDD 工作室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邮 编：100005

电 话：010 - 65270477

传 真：010 - 65270449

销售热线：010 - 65512133

E - m a i l :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河北大厂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 × 1092 1/16

印 张：18. 25

版 次：2006 年 1 月第一版 200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29. 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遥远的跋涉

(代序)

—

张全之教授的专著《火与歌——中国现代文学、文人与战争关系史论》即将付梓印行，僻居岭南的我当然是遥对泰岱，以手加额，对全之表示由衷的祝贺。

全之虽算是我的学生，不过他入我们攻读博士学位之时，就已经是一个颇有文名的教授，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学者；他关于东方主义与鲁迅价值定位等文章所引起的反响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他当时已任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那是一所我比较熟悉的学府，他的老师如魏绍馨先生，以及当时仍然健在的谷辅林先生，都是我十分敬重且关系较为紧密的前辈，于是我与他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更加亲切。自然就是因为这样一种亲切的关系，全之这部书稿完成之后，便电邮给我且邀我写序。

我颇有点踌躇。第一，我没有对本书论述的这个专题下过任何功夫，按说没有资格说三道四；虽说当今社会最正常的情形似乎就是：越是没有某种资格的人偏偏会在肮脏的裙带关系的作用下被推向某些关键岗位，生活在当下最重要的生存本领似乎就在于：越是没有资格去做的事情越要做得津津有味、煞有介事。不过真要那样地不顾脸面，多少还是会有些发怵。第二，全之的博士论文做的是中国新文学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这本研究现代文

学中的战争题材的专著完全是他自己独立选题、自主完成的项目，按说大可以不必由旁人来指指点点，虽然研究生毕业以后仗着导师的资格强掳学生课题的“宁馨儿”并不罕见，不过那不仅要面皮撕得开，手也要下得去才行。第三，自背井离乡、流落南国之后，诸事繁杂，心绪难静，常常将很多事情拖托得很久，也因此生怕耽误了全之出书的时间。

踌躇之间又过了两个多月，全之还是执念旧谊，坚请为序。我自觉却之不恭，而且因为上述第三点，每每感觉对不起包括全之在内的许多朋友和学生，实在有必要利用某个机会对我的朋友特别是我的学生们说一些交心的话，于是就在这月照云影、花溢深树的美好夜晚，在这更深入静、虫鸣唧唧的南风窗下，对着电脑键入如下思绪，权充小序。

二

久旱的高原想望着蔚蓝的大海，于是连接其间的广袤的大地不再皴裂；浩瀚的水域企盼着绿色的岸柳，于是奔涌其间的层叠的波浪不再汐落。造化的伟岸和神启的广阔都如此向往着迁徙与流动，何况灵异的人类与平常的凡夫俗子？特别是我自己。我曾经“给自己写信”，在人生刚刚展开它最初的疲惫与引诱的时候，我就像伸不长颈脖的企鹅一样艰难地企望着田园以外的街市，街市以外的长天，长天以外的世界。便是那无以名状的世界给我送来白茫茫一片的信息，我也不惜舍弃我修葺了的家园，舍弃老母亲的悬望，背上我的行囊开始遥远的跋涉。

不大的行囊，我却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在那里苦苦收拾，背上它踏上真正的人生之旅，才感到原来它就是那么地轻便。翻山越岭之际从不需要放下它来，因为它的装点，我才真正像一天涯的旅人。每当有些累了的时候，我就地落坐在山坡的草径，斜倚在行囊之上，一手笨拙地掏出一包还未拆封的香烟，抖抖索索地抽出一支，很不熟练地打着火，很不准当地燃起，吸着，然

后对着流汗的丛林，对着澄明的南天喷吐一团，雾不像雾，烟不像烟，那神情倒是特别的爽气。

行囊中有若干叠寄不出去的信函，因为收信人是跋涉中的我；也有尚未印成书的稿件，因为印书的刻工也是跋涉中的我。艰难而带着快意的跋涉让我难以抽出时间来理索这些东西，于是只好带着它们，邀约着它们陪我远走天涯。行走的时候稍一撮弄，干燥的纸壁摩擦着的哗哗声就是它们对我的抱怨。我不能过多地理会它们的抱怨。悠远的草径正因我的脚步的到来在积极地向荒芜和荆棘中无限地延伸，原是满面笑靥的向导这时候正用神秘莫测的眼光盯着我，看我先迈出左脚还是右脚。来自我最亲近的人的呼唤这时候我只能置之不理，包括我一直忘怀不了的我的学生：毕业了的与尚未毕业的，答辩过了的与尚未答辩的，硕士和博士，男生和女生，笑容满面的和愁眉苦脸的。我将他们的状况和表情一一装进了我的行囊，背着，但是似乎再也来不及打开，于是我能听到纸壁摩擦似的抱怨之声。真的，好几个学生给我发的信我可能已经有两个月没加处理，即使有所处理的，那也是在他们分别来过三次或更多次的信函催促过以后的事情。

全之的来信得到了我这样的回应，也是他多次催促的结果。我想他能够理解一个中年跋涉者的心情，实际上他也并不拒绝跋涉，尤其是出于学术的理由。跋涉毕竟不是漂泊，跋涉之于学术其实不需要太多的理由，更没有任何伤感的成分。不拒绝跋涉的人应能很便当地理解这些，于是我给他和他们写上了上面这些类似于吃语的自白。不过即使是这样，我还是要对全之，对我的学生们说明白：请你们理解和谅解。我毕竟是在跋涉，而不是在漂泊。漂泊者虽然感伤，但他是多么的自由。跋涉者却是自己将自己绑缚在通向某个目标的路线上，有时候就是让你动弹不得。

三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军事题材、战争题材的研究，已经有

不少研究成果面世，包括陈辽、方全林先生的《中国现代军事文学史略》等。但我仍觉得全之的这部书有他自己的新意。论著始终围绕着人与战争的关系展开，在“浴火”的酷烈和残忍中凸显出人性关怀、人道关怀和人文关怀，理性地还原了“人的文学”的现代文学道统命题。这样的研究相比于“现代军事文学”的视角，不仅更具有理论的穿透力和人文批判内涵，而且有效地拓宽了论题的领域。否则，沈从文的创作就不可能得到如此强烈的凸显，胡适更不可能在类似的话题中得到如此重视。

这本富有新意的论著，就其论题的集中性而言，篇幅已经足够。但如果能够扩充，我盼望着出现更加充分的总论性的内容。现代文学一开始大抵是反战、厌战、仇兵、咒兵，发展到后来则是喜战、恋战、爱兵、敬兵，这其中固然那“战”与“兵”的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作家的创作心理、读者心理和民族心理的变化不容忽视，如能从理论上对此加以较为深刻的揭示，则这一话题的任务完成得将更为精彩。其实，这不单是一个理论问题。至少在我们这一辈，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喜欢看打仗的电影，看机枪扫射的镜头便有一种淋漓的快感，养成这种近乎于残忍的欣赏心理，其实与全之这本论著中展开的话题完全有关。

全之的这部书稿我是粗粗看过了，由于缺少相应的专攻，说不出什么更多的话来。但我感觉他写得十分认真。这也就成了我对这本书自信的基础。全之做事为人人都讲认真，以他的能力和才华，则只要认真必能有较圆满的学术收获。我知道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做得相当认真，结果成绩也相当出色，包括温儒敏教授在内以严格著称的专家，都对他的“无政府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之关系”的研究给予相当肯定的评价，这就是明证。我盼望着他早日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的修改并尽快印行，我盼望着给他的那本书写上我的评价和祝贺，当然也无妨被叫做序言一类。

朱寿桐

2005年5月16日于暨南大学

目 录 CONTENTS

01—04 遥远的跋涉（代序）／朱寿桐

上编 战争中的文人与文学

第一章 五四精神传统：在政治斗争与战火焚烧中的艰难历程

03—09 一、给中国革命党“补习的功课”

10—22 二、“救国”与“救我”：“个人”在政治运动中的命运

23—34 三、一个传统与两个政党：五四精神之殇

第二章 胡适：抗日浪潮中的“书生之见”

35—42 一、“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

43—47 二、“做了过河卒子，只得拼命向前”

第三章 老舍：民族战争中的创作转向

48—56 一、战争“记忆”与老舍“仇洋”心态的形成

57—65 二、战争现实：“仇洋心态”对老舍创作的影响

66—68 三、余论：对老舍抗战时期文学创作的反思

第四章 沈从文：民族战争中的文学立场

69—78 一、在抗战大潮中的人生选择与文学追求



79—98 二、沈从文笔下的军人世界

下编 文学中的军人与战争

第五章 “兵”与“人”：五四“非战文学”简论

- 101—105 一、“兵灾”备忘录
106—108 二、军人在审判、忏悔中的觉醒
109—118 三、五四战争小说的“三无”特征
119—125 四、“是兵还是人”：对军人理想人格的呼唤

第六章 人道视野中的反战文学

- 126—136 一、由敌人到“兄弟”：血腥暴力下的人性闪现
137—143 二、“逃兵的自白”：喜剧性的战争讽刺画

第七章 “战场”与“洋场”：中国左翼文学的双重面影

- 144—149 一、上海“洋场”：从“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
150—153 二、红色苏区：文学大众化的实践形态
154—157 三、战争年代是否有文学：对左翼文学的反思

第八章 民族主义文艺的陷阱：右翼战争小说论

158—170

第九章 仇恨的三种形式：早期抗日战争小说论析

- 171—176 一、民族仇恨：早期抗战小说对民族仇恨的渲染与煽动
177—181 二、阶级仇恨：早期抗战小说对民族仇恨的升华
182—187 三、对战争的仇恨：早期抗战小说的人道主义倾向

第十章 民族性·阶级性·人性：抗战时期“战争小说”的观念纠葛

- 188—201 一、民族性：不无偏至的求生之路

202—208	二、阶级性：难以摆脱的羁绊
209—220	三、人性：被压抑的潜流
第十一章	丘东平：以五四精神之火烛照军人世界
221—233	一、带着五四的精神装备进入抗战文学的创作之中
234—238	附：对丘东平之死的两点辨证
第十二章	解放区抗战小说：中国传统战争小说艺术的“回光返照”
239—250	
第十三章	综论 中国现代战争小说的荒欠与成因
251—258	一、文化启蒙主题对战争小说的压制与排斥
259—262	二、中国现代战争小说传统的缺失
263—266	三、现代战争小说“人物中心”观念的缺失
267—271	四、现代作家战争经验的缺失
参考书目	
272—276	
后 记	
277—283	

上 编

战争中的文人与文学

五四精神传统：在政治斗争与 战火焚烧中的艰难历程

一、给中国革命党“补习的功课”

“五四”时期，有一位日本记者问陈独秀对中国政治的见解，陈独秀说“取消帝政，改建共和”。这位日本记者大惑不解，因为清帝早已退位，中华民国建立也有近 10 年的历史了，何谓“改建共和”？陈独秀问他：“中国现政治的实质是帝政还是民治呢？”他恍然大悟，笑着回答说：“自然还是帝政”。^①为此，陈独秀撰写了《中国革命党应该补习的功课》一文，给中国革命党开列了三门课程：

- （一）多数人民应该懂得民主政治究竟是什么。
- （二）怎样完全取消帝制。
- （三）怎样建设民主政治。

陈独秀“开设”的这三门课程很有针对性，其目的是为了培养新的革命者和新的政党。中国的革命党自然不会放下手里的枪，

^① 陈独秀：《中国革命党应该补习的功课》，《星期评论》第 31 号，1920.1。

到“陈氏学堂”去做学生，但陈独秀的这一主张，可以说是很多“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的共识，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辛亥革命进行批判和反思的结果。辛亥革命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皇帝赶出了历史舞台，匆匆挂起了共和的招牌。但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们自身有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危机。从军事力量上来说，“同盟会”内部在革命问题上矛盾重重，在国内与各省政权之间的联系也极为松散。在建立革命政府的14个省份中，原有的革命组织仅获得了3个省（广东、江西和安徽）的坚定支持，所以说“革命者从来没有完全把握住革命，当然也就决定不了其结果”^①，妥协就在所难免。

在观念领域，辛亥革命缺乏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为前导，也就必然缺少广泛的群众基础。在中国广大国民的心目中，孙中山或者是“乱党”，或者是“真龙天子”，唯独不是一位共和领袖。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觉得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②。社会表面的剧烈动荡，像水面的波纹，没有触动水下的砂石，主子/奴才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依然生机盎然地存活在广大民众的观念世界之中。因此，中华民国就像一株无根的植物一样，注定要枝枯叶残。对此，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都看得非常清楚。陈独秀认为革命党“从前宣传民治主义的功夫简直没有做，取消帝政的力量也没尽得足，就匆匆忙忙挂上了共和的招牌”，就像一个“素不用功侥幸及第的学生一样”^③，需要赶紧补习功课，否则，袁世凯又会“复活”！鲁迅对中国封建社会以来的中国革命进行了总体反思，发现了千变

① [美] 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3页。

② 《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以下引《鲁迅全集》未注明版本处，均为此版，不再一一注明）。

③ 陈独秀：《中国革命党应该补习的功课》，《星期评论》第31号，1920.1。

万化的革命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奴才式的革命”——以一种暴政代替另一种暴政，以一种不平等代替另一种不平等，革命者所要获得的只有三样东西：“威福，子女，玉帛”，阿Q在梦见革命成功之后表现出的那幅“流氓无产者”嘴脸，是中国革命者的写真图。杀掉权势者和仇人、占尽天下财物、随意挑选女人——这岂止是阿Q独有的梦想？几千年中华大地上狼烟滚滚，为首者手里挑着各种各样的旗子，心里边又何尝不和阿Q做着一样的梦？在这一梦境的驱使下，血腥的未庄在阿Q革命之后，将会变得更加血腥，在人格上，“阿Q=赵太爷”。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无不在阿Q式的革命梦境中循环，以“三民主义”为指导的辛亥革命亦未能逃脱这一历史的怪圈。辛亥革命爆发时鲁迅在绍兴，他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非常兴奋，“觉得将来中国很有希望”^①。在当时撰写的《〈越铎〉出世辞》中，他毫不掩饰内心的激动：“国土恒恒，则首举义旗于鄂。诸出响应，涛起风从，华夏故物，光复太半。东南大府，亦赫然归其主人。……民气膨胀，天日腾笑，孰善赞颂，庶猗伟之声，将充宙合矣。”^②但兴奋是暂时的，他很快就发现“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③对现实的深刻洞察，证实了他对历史的判断——这又是一次“换汤不换药”的政治动荡。他不禁感慨：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

① 《鲁迅全集》（第11卷），第31页。

② 《鲁迅全集》（第8卷），第39页。

③ 《鲁迅全集》（第1卷），第3页。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①

“什么都要从新做过”，表明鲁迅对辛亥革命的彻底失望乃至绝望。历史与现实宿命般的循环，使他意识到“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②。胡适在回国时强调自己“二十年不谈政治”，这一立誓，正说明他内心深处对政治的强烈关注，否则何需发誓？他希望通过文化变革来干预中国历史的发展，将变革文化作为改良政治的捷径，这里包含着更为热切的政治期待。陈独秀是老革命者，他在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说明他开始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救国立场从政治革命（救国）向思想革命（救人）转移，以企为此后的政治革命准备充足的“修满思想课程”的“新青年”和广泛觉醒的群众基础。在陈独秀的构想中，“新青年”和“旧青年”在生理和心理上有重要区别。在生理上，旧青年“美其貌，弱其质”，“艰难辛苦，力不能堪”，而“新青年”“壮健活泼”、“威武陵（凌）人”；在心理上，“旧青年”皆有“升官发财”四个大字，“腐败堕落”不思进取，而“新青年”有“真实新鲜之信仰”，“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③。陈独秀用自己手里的杂志，启动了具有明确现代意识的青年改造工程。他的这一举措，引起了进步知识者的共鸣。他的贡献也就在这里：他将一大批有志于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挽狂澜于既倒的优秀知识分子吸引到自己周围，那么引发一场文化运动，来为中国革命党补课，就成为

① 《鲁迅全集》（第3卷），第16页。

② 《鲁迅全集》（第11卷），第31页。

③ 陈独秀：《新青年》，载《新青年》杂志第2卷第1号。



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了。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辛亥革命形式上的成功与本质上的失败，是驱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得以发生的直接原因^①。由此我们就抓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为隐秘的动机：“为中国革命党补习功课”。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这场看似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文化运动，其实本质上是一场政治运动，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给中国未来的革命准备觉醒的群众基础和富有现代意义的先驱，以保证当共和招牌再一次挂起来的时候，不只是一块招牌，而是名至实归。至此，我们终于明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为什么一面表白不谈政治，一面又对政治喋喋不休的缘由了，他们是以远离政治的方式投入政治，所谓不谈政治是假，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政治才是真。

时代的际遇与他们自身的内在要求，使他们在不自觉中以《新青年》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既是多元的又是独立的文化空间。所谓多元，是指《新青年》团体内部各成员之间，思想上存在很大分歧，尤其是几个主要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李大钊等在思想上各呈其色，这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们在“文化革命”这面大旗下紧紧凝聚在一起，保证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外在的一致性和内在的丰富性。所谓独立，是指这一群知识分子赶上了像战国时期那样特殊的政治环境，他们不必图解“圣意”，也不必诠释“圣贤”，更不必靠“媚俗”为生。他们在“庙堂”与“民间”的缝隙里找到了自己独立的话语空间，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纵观整个20世纪，像这样富有冲击力的文化阵线并不多见。在这一多元、独立的话语空间内，他们可以尽情地击“东”扬“西”、伐古颂新，并进而教育青年，启发民众，抨击权贵，指导革命。这一独立的话语空间像一个聚光灯下的舞

^① 关于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因果关系，已有学者进行了研究。见陈万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源流》，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